

## 作為公共治理平台的城市節慶活動：澳門經驗與中國式現代化的推進

高咏軒<sup>\*</sup> 張軍華<sup>\*\*</sup>

【摘要】 本文將城市節慶活動重新概念化為一個公共治理平台，以此視角考察澳門相關活動在推進中國式現代化中的效能。研究梳理了澳門節慶活動從民俗節慶到戰略性治理平台的發展脈絡，並分析其當前面臨協作碎片化、參與單向度、評估片面化等治理瓶頸，制約了在社會共治、文化認同、綠色發展等方面目標的實現。據此，本文提出以“創意賦權”、“綠色治理”與“開放協作”為核心的系統性優化路徑，旨在推動澳門城市節慶活動從一項文化與經濟工具，向能夠承載並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目標的戰略性公共治理基礎設施轉型，從而為特區政府提升治理效能、為澳門實踐中國式現代化提供學理參考與政策行政。

【關鍵詞】 循環公共治理 城市節慶活動 澳門 中國式現代化 文旅融合

### Actividades festivas urbanas como plataforma de governança pública: A experiência de Macau e a promoção da modernização de estilo chinês

Gao Yongxuan Zhang Junhua

**Resumo:** Este artigo reconceptualiza as actividades festivas urbanas como uma plataforma de governança pública, examinado, sob esta perspectiva, a eficácia das referidas actividades de Macau na promoção da modernização de estilo chinês. O estudo traça a evolução das actividades festivas de Macau desde festividades folclóricas até ao posicionamento como plataformas estratégicas de governança, e analisa os actuais obstáculos de governança que as mesmas enfrentam tais como a fragmentação colaborativa, a participação unidireccional e a avaliação parcial, que condicionam a realização dos objectivos no âmbito da co-governança social, da identidade cultural e do desenvolvimento verde. Com base nisso, este artigo propõe vias sistemáticas para a optimização que residem em “empoderamento criativo”, “governança verde” e

---

\* 高咏軒，澳門城市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文化產業研究博士研究生。

\*\* 張軍華，廣東財經大學人文與傳播學院新聞傳播學教授。

“colaboração aberta”, visando ajudar o Governo da RAEM a potenciar a eficácia da governança pública das actividades festivas e fornecer referências académicas e orientações de políticas para a concretização da modernização de estilo chinês em Macau.

**Palavras-chave:** Governança pública circular, Actividades festivas urbanas, Macau, Modernização de estilo chinês, Integração cultural e turística

## 一、引言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央政府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佈局、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佈局，中國式現代化發展道路越發寬廣。在此宏觀背景下，澳門特別行政區積極對接國家戰略，在《澳門特別行政區經濟和社會發展第二個五年規劃》中明確強調推動經濟適度多元發展和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sup>1</sup> 文旅產業作為澳門的支柱產業，其活力正持續攀升。數據顯示，2024 年全年入境旅客約 3,493 萬人次，較 2023 年的 2,821 萬人次實現大幅增長；與此同時，會展活動數目在 2024 年達到 1,524 項，較 2023 年的 1,160 項增長逾 30%。<sup>2</sup> 在此進程中，城市節慶活動作為一種特殊的公共文化服務形式與治理工具，憑藉其影響範圍廣、傳播能力強、地方特徵鮮明及創新性突出等特點，發揮著重要作用。隨著文化與旅遊加速融合，澳門的品牌節慶活動，如格蘭披治大賽車、國際音樂節等，其文化傳播與公共服務屬性不斷提升，不僅是驅動上述增長的核心引擎，更成為特區政府實施文化治理、塑造城市品牌、推進現代化進程的有效載體。因此，本研究將澳門城市節慶活動視為一個公共治理平台，聚焦於其在文旅融合與公共治理背景下對中國式現代化的傳播與推進效能，並探尋治理的優化路徑，通過分析內在關聯，並為特區政府優化相關政策提供學理參考。

---

<sup>1</sup> 中央人民政府駐澳門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2022-02-14），《澳門特別行政區城市總體規劃（2020-2040）》公佈。[https://www.zlb.gov.cn/2022-02/14/c\\_1211570776.htm](https://www.zlb.gov.cn/2022-02/14/c_1211570776.htm)

<sup>2</sup>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暨普查局（2024）。《2024 年統計年鑑》。177-180。

## 二、理論基礎：從文化活動到公共治理平台

城市節慶活動作為一種複雜的社會現象，長期以來被置於文化研究、經濟學與傳播學的視域下進行審視。為構建本文的公共行政研究視角，首先需對既有理論進行梳理，並引入公共行政學的核心理論框架，從而論證從公共治理平台視角審視節慶活動的可行性與獨特價值，並確立清晰的分析路徑。

首先，經典的文化經濟學理論為我們理解節慶活動的基礎價值提供了起點。正如艾倫·斯科特（Allen J. Scott）所指出，城市、文化與經濟處於一種“共生”關係，具有地方特徵的文化形式與經濟活動之間存在著持續不斷的雙向運動。<sup>3</sup> 這一論述揭示了澳門節慶活動的根本特徵：其獨特的中西文化底蘊本身就是一種關鍵的經濟資源，而旅遊經濟的發展又反哺於文化的傳承與創新。基思·丹尼（Keith Dinnie）的城市品牌理論進一步強化這一觀點，他認為標誌性活動能凝聚居民共識、塑造遊客體驗，最終建立起獨特的城市品牌識別度。<sup>4</sup> 這解釋了特區政府為何願意投入資源打造品牌節慶，其根源在於這些活動本身是城市競爭力的直接體現。

上述視角偏重於節慶活動的文化與經濟價值，而較少觸及其在權力結構、資源配置與政策過程等維度的公共管理意涵。因此，本文引入“協作式治理”（Collaborative Governance）理論作為核心分析框架。Ansell 與 Gash 將其定義為“一個讓多個利益相關方共同參與公共政策制定與管理的規制性、協商性與決策性過程”。<sup>5</sup> 澳門節慶活動的籌辦，正是一個典型的協作式治理實踐場域：其過程涉及文化局、旅遊局、體育局、市政署等多個政府部門的橫向協同，更需要整合來自企業、社團、社區組織及公眾的資源與力量。這種跨部門、多主體的複雜協作，遠非單純的市場行為，其本質是特區政府為實現特定公共目標（如經濟多元、文化傳承、國際宣傳）而主導建構的一種制度化的集體行動機制。

在此理論基礎上，本文將澳門的城市節慶活動重新概念化為：一個以創造複合型公共價值為導向的戰略性治理平台。此概念採廣義界定，涵蓋傳統民俗

---

<sup>3</sup> Scott, A. J. (2000). *The Cultural Economy of Cities: Essays on the Geography of Image-producing Industries*. Sage Publications. 323-336.

<sup>4</sup> Dinnie, K. (2010). *City Branding: Theory and Cases*. Palgrave Macmillan. 54-61.

<sup>5</sup> Ansell, C., & Gash, A. (2008).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in Theory and Practice”.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 18(4), 543-571.

節慶、文化藝術盛事、標誌性體育賽事及與文旅融合緊密相關的大型會展活動。此概念包含三個核心層次：第一，其目標不僅是經濟產出，更是莫爾（Mark H. Moore）所強調的公共價值，即為公民創造的不僅是服務，還包括信任、社會公平與文化認同等無形價值。<sup>6</sup> 第二，其運作模式是協作式的，強調政府、市場與社會之間的夥伴關係與網絡化治理。第三，其本質是一個平台，它匯聚了各類資源與行動者，為政策創新與社會互動提供了物理與社會空間。

這一理論框架能夠有效容納並提升既有視角：謝靜關注的社區傳播與空間生產，可解讀為治理平台對社會關係與空間權力結構的重塑<sup>7</sup>；理查德·佛羅里達（Richard Florida）對創意階層的呼喚，可轉化為平台構建開放制度環境的政策議題<sup>8</sup>；梅洛·龐蒂（Maurice Merleau-Ponty）的“具身傳播”概念，則從現象學層面解釋了該平台能通過沉浸式體驗更有效地傳遞價值觀與文化內涵。<sup>9</sup>

綜上，通過引入協作式治理與公共價值理論，本節致力於將對城市節慶活動的認識，從一個側重於結果（文化與經濟效益）的客體，轉變為一個側重於過程（多方協作與價值共創）的主體。這一定位轉變，為後文分析澳門節慶活動在中國式現代化傳播中的具體表現與優化路徑，構建了公共行政學的分析框架。

### 三、澳門城市節慶活動的發展脈絡與組織實施現狀

承接前述理論框架，本研究在廣義範疇下審視澳門的城市節慶活動，將會展等活動納入同一分析視野。此界定基於它們在治理邏輯上的同構性，即均為需要跨部門協作、多主體參與以創造公共價值的戰略性平台。

此一範疇界定主要基於兩點核心考量：第一，理論層面的整合性。從“公共治理平台”的理論視角審視，上述活動共享一種共通的內在邏輯，皆是由特

---

<sup>6</sup> Moore, M. H. (2013). *Recognizing Public Valu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6-33.

<sup>7</sup> 謝靜（2022）。《城市社區傳播與空間生產》。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59-69 頁。

<sup>8</sup> “創意階層”由理查德·佛羅里達提出，指從事創造新觀念、新技術、新內容或創造性工作的核心社會群體，其聚集被視作推動城市經濟增長與創新的關鍵動力。參見理查德·佛羅里達（2010）。《創意階層的崛起》。北京：中信出版社。104-109 頁。

<sup>9</sup> “具身傳播”概念強調，意義的傳遞與理解並非純粹的抽象過程，而是深深植根於身體感知、運動與所處環境之中，因此沉浸式的身體體驗能更有效地內化價值觀與文化內涵。參見 Merleau-Ponty, M., Landes, D., Carman, T., & Lefort, C. (2013). *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 Routledge. 174-184.

區政府主導或深度參與、需要跨部門協作與多主體資源整合、並以創造複合型公共價值為目標的戰略性集體行動。將會展活動納入，恰恰可以驗證“治理平台”理論的適用性與解釋力。第二，實踐層面的融合性。在澳門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與“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台”的戰略背景下，文化、旅遊、會展等產業的邊界日益模糊，呈現出“文旅會展”融合發展的鮮明趨勢。將會展活動與傳統節慶置於同一治理框架下審視，更能貼近澳門城市發展的現實邏輯與政策實踐。

基於此，下文將在這一廣義範疇與分析視角下，系統梳理澳門節慶活動的發展脈絡與治理現狀。

### **（一）發展歷程：從民俗節慶到戰略性治理平台**

澳門城市節慶活動的發展大致可劃分為三個階段，其活動類型與治理邏輯呈現出清晰的演進脈絡：

#### **（1）傳統民俗主導階段：作為非正式治理與社會資本積累的雛形**

此階段的節慶活動以民間自發組織的宗教與民俗活動為主體，如哪吒誕、土地誕、魚行醉龍節等。這些活動並非僅止於單純的民俗展演，其本質上更可視作一種基於宗親與地緣紐帶的非正式治理機制。它們通過周期性的儀式與集體參與，有效強化了社區內部的認同感與凝聚力，在客觀上實現了社會整合與文化傳承的治理功能。此時，政府的角色雖相對超然，但並非完全缺席。這種有限度介入的立場，在某種程度上體現了當時的治理模式特點。此階段已創立的“澳門國際龍舟賽”，其定位雖以民間體育競技為主，尚未被系統性地發掘其文化與經濟價值，但它與各類民俗活動共同為澳門積累了深厚的社會資本與文化資源。這一原生狀態，為日後特區政府將其提升為戰略性的治理平台，提供了重要的社會基礎與文化根基。因此，本階段可被視為澳門節慶活動作為公共治理平台的歷史雛形與邏輯起點。

#### **（2）品牌化與國際化階段：作為戰略性政策工具與品牌治理的構建**

隨著澳門回歸與旅遊博彩業的蓬勃發展，特區政府對節慶活動的治理邏輯迎來關鍵轉型。在這一階段，政府開始以更為積極、主導的姿態，將節慶活動

系統性地納入城市發展的頂層設計，其核心目標明確指向提升國際知名度與推動經濟適度多元。

在實踐層面，政府通過雙軌並行的策略推進品牌建設：在國際化維度，以格蘭披治大賽車、澳門國際音樂節等高規格活動為媒介，致力於將澳門推向全球旅遊與文化版圖；在本土化維度，則通過創辦澳門美食節等活動，對地方飲食文化進行符號化包裝與推廣，使其轉化為具有市場吸引力的旅遊資產。此類活動的運作已呈現出專業化、標準化與高度組織化的特徵。

整體而言，本階段確立了“文化搭台，經濟唱戲”的明確政策導向，節慶活動已超越其原生文化功能，轉型為特區政府用於城市行銷與產業發展的戰略性政策工具。這一轉型不僅標誌著政府治理角色從邊緣走向主導，也為節慶活動後續演化為承載多元公共價值的綜合性治理平台，奠定了關鍵的制度基礎與實踐經驗。

### （3）治理導向與融合發展階段：作為複合型公共價值創造平台的成型

在國家“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定位及“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等戰略引領下，澳門節慶活動的治理邏輯迎來深度轉型，其角色從側重經濟收益的戰略工具，進一步演進為旨在創造複合型公共價值的協作平台。此階段的標誌在於，治理目標實現了從相對單一向多元融合的系統性升級，涵蓋文化、社會、經濟與生態等多重維度。

具體而言，其治理實踐呈現出兩大特徵：在功能拓展層面，節慶活動超越傳統觀光範疇，承載起更深層的公共使命。例如，澳門拉丁城區幻彩大巡遊、中葡文化藝術節等活動，著力構建跨文化對話的公共空間；而持續舉辦的塔石藝墟，其功能已從文創市集演化為鏈接本地創意人才、社群網絡與公共資源的常設性中介平台，彰顯了其在激發社會創新與促進社區參與方面的治理效能。在理念革新層面，整體規劃體現出對社會效益、文化傳承與環境可持續性的綜合考量，顯示特區政府的治理焦點已從短期經濟產出，轉向對長期性、非物質性公共價值的戰略性投資。

這一階段的發展表明，節慶活動已深度嵌入特區的現代化治理體系。它不僅是政策執行的載體，更成為政府聯結市場與社會、整合多元目標、並最終踐行中國式現代化內涵的關鍵操作性平台，標誌著澳門節慶治理範式趨於成熟。



縱觀上述歷程，澳門城市節慶活動的治理功能呈現出清晰的演進脈絡：從側重內部整合的“文化自娛”與“社區凝聚”，轉向對外開放的“經濟引擎”與“品牌塑造”，最終邁向多元主體參與的“價值共創”與“戰略治理”。與此相應，政府的治理角色也實現了從協調引導者到主導推動者，再到平台搭建者與協同引導者的深刻轉型。貫穿這一演進歷程的核心主線，是節慶活動作為中西文化交融核心載體及塑造“愛國愛澳”身份認同的持續作用，這一根本定位構成了理解其作為公共治理平台的歷史根基與邏輯前提。

## （二）組織實施現狀與治理效能分析

當前，澳門節慶活動在組織實施層面雖已建立起基礎框架，但其治理效能仍面臨一系列挑戰，具體表現為一種“強主導而弱協同、重投入而輕活力、有參與而乏共治、看經濟而略價值”的結構性挑戰。

首先，在治理主體與協作網絡上，呈現出“碎片化”格局。儘管已形成以文化局、旅遊局為核心，多部門協作的“大型活動跨部門工作組”機制，但此種協作多屬針對具體活動的“任務型”響應，未能昇華為常態化的戰略規劃與資源共享平台。部門間的職能壁壘導致政策難以深度融合，例如文化局所推動的藝術活動，其內涵往往難以被旅遊局的市場推廣計劃有效吸納與轉化，致使活動的整體效益與長期可持續性受到制約。

其次，在資源配置與運營模式上，存在“結構性失衡”。現行模式以公共財政投入為絕對主體，雖在部分活動（如 MIF）中嘗試引入市場化運營，但社會資本與專業機構大多僅被定位為執行方，而非平等的合作夥伴。這種對財政的過度依賴，不僅持續加重政府負擔，更在無形中壓抑了市場與社會本應迸發的創新活力，使得眾多節慶活動難以形成自我造血的良性循環。

再者，在社會參與機制上，表現出“單向度”特徵。儘管通過“塔石藝墟”、“文化發展基金”等渠道為社會創意的湧現提供了空間，但公眾與社團的角色仍被侷限於活動執行與內容提供層面。在議題設定、頂層規劃與績效評估等核心治理環節，社會力量的話語權依然薄弱，這導致理論上的“協作式治理”在實踐中僅停留在操作層面，使其難以觸及戰略高度，從而影響了“社會共治”目標的實現。

最後，在評估與價值引導機制上，呈現“片面化”傾向。現行評估體系過度側重於人流、經濟收益等易於量化的短期指標，這無形中引導資源與注意力向這些領域傾斜。由此，對於節慶活動在提升公民素質、增強文化認同、促進環境可持續性等方面的深層次公共價值，由於缺乏系統性的衡量標準與追蹤反饋，難在決策與資源分配中得到應有的重視與激勵，導致其推動中國式現代化的戰略作用難以被有效彰顯與優化。

綜上所述，當前澳門節慶活動在組織實施上面臨的“結構性挑戰”，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其作為公共治理平台在推動中國式現代化目標上的效能。“碎片化”格局與“單維度”參與，使得“社會共治”格局與社會創造力的激發難以充分實現；“片面化”的評估導向，導致對“公民素質與文化認同”等深層價值的衡量與培育未能得到應有關注；而綠色實踐的不足，也制約了其與“高質量發展”和“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生態文明理念的深度融合。因此，為更有效地發揮節慶活動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戰略作用，有必要針對上述環節進行系統性的治理模式革新。

## 四、節慶活動作為中國式現代化的治理載體：

### 澳門的實踐邏輯與功能呈現

#### （一）內在關聯：互為載體，協同共進

澳門城市節慶活動與中國式現代化之間，在特區政府政策驅動下形成一種“互為載體，協同共進”的深層結構性關聯。

##### （1）作為政策傳播的樞紐：從抽象理念到具身體驗

中國式現代化是一個內涵豐富的宏觀理論體系，其在地化傳播面臨著從“政治話語”轉化為“公眾認知”的挑戰。城市節慶活動，憑藉其體驗性、娛樂性與大眾性，成為完成這一轉化的理想樞紐。特區政府通過主辦或支持各類節慶，並非僅僅提供娛樂，而是在進行一場精細的公共價值敘事。例如，“澳門國際煙花比賽匯演”不僅是一場視覺盛宴，其“和平、友誼與合作”的內在主題，正是對中國式現代化“走和平發展道路”的國際化、藝術化表達。在此



過程中，政府從傳統的政策宣講者，轉變為公共價值的策劃者與引導者，通過創設情境，讓居民與遊客在愉悅的“具身傳播”中，潛移默化地感知和理解國家與特區的發展理念，極大提升了政策傳播的效能與親和力。

## （2）作為現代化成果的展演：從政策文本到民生獲得感

中國式現代化強調“五個文明”（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會文明、生態文明）的協調發展，其成果最終要體現在人民的獲得感、幸福感與安全感上。這五大文明構成了推動社會全面進步的系統性框架：物質文明夯實發展基礎，政治文明完善治理體系，精神文明塑造價值認同，社會文明促進公平正義，生態文明確保永續發展。

澳門節慶活動恰成為將這一宏大敘事轉化為具身化體驗的動態櫥窗：在物質文明維度，格蘭披治大賽車等大型活動激活了廣泛的產業鏈與商業生態，將經濟多元發展政策轉化為可見的就業與商機；在政治與精神文明維度，國際音樂節等活動通過開放包容的節目遴選機制，實踐公共文化治理，使文化自信在審美體驗中具象化；在社會文明維度，傳統節慶通過周期性集體參與重構情感化的公共領域，強化社群認同；在生態文明維度，綠色措施將可持續發展理念轉化為可實踐的公共規範。

由此，節慶活動系統性地將靜態政策文本轉化為可感、可知、可參與的鮮活經驗，使中國式現代化在澳門的實踐變得可視、可觸、可共情。

## （3）作為治理創新的試驗場：從頂層設計到本土化實踐

中國式現代化是一個動態發展的過程，其內涵在實踐中不斷豐富。澳門以其獨特的“一國兩制”制度優勢和中西文化交融的社會背景，為中國式現代化提供了特殊的試驗場景。城市節慶活動作為一項需要多部門協作、多主體參與的複雜公共事務，其策劃與執行過程本身，就是對特區政府協作治理能力的持續考驗與提升。例如，如何在大賽車期間平衡國際形象、居民生活與經濟效益，如何在傳統節慶中實現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這些實踐中積累的經驗與模式，都是對中國式現代化理論寶庫的豐富。它們提供了在一個高度開放、文化多元的微型經濟體中，如何實現高質量治理、文化自信與可持續發展的“澳門經驗”，為中國式現代化的理論與實踐積累了獨特的本土經驗。

綜上所述，節慶活動在澳門已深度嵌入特區治理肌理，既是傳播中國式現代化的媒介，也是衡量其發展程度的刻度尺，更是推動其內涵創新的催化劑。

## （二）實踐表現：澳門案例的三大維度

在明確內在關聯的理論基礎後，我們可以從公共治理的視角，審視澳門城市節慶活動在實踐中承載和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三大核心功能。這些功能超越了節慶的表象，直指其作為治理工具的深層價值。

### （1）文化認同的構建功能：從民俗傳承到價值共同體塑造

中國旅遊研究院所指出的從“看山看水”到“人間煙火”的轉向，本質上是遊客對地方性知識與真實文化體驗的追求。這與特區政府通過節慶活動構建社會認同、強化“愛國愛澳”社會基礎的治理目標高度契合。澳門豐厚的文化遺產為此提供了堅實基礎。據文化局資料顯示，澳門現有 70 個項目被列入《非物質文化遺產清單》，其中 12 項被列入更高級別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構成了一個龐大的文化基因庫。<sup>10</sup> 研究表明，旅客對傳統文化節日的真實體驗深刻影響其對節日及場所的身份感知。<sup>11</sup> 據此，澳門的農曆新年花車匯演、浴佛節、哪吒誕等，已從單純的民俗展示，轉型為精密的文化治理實踐。政府通過對這些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的資助、協調與推廣，將其打造為流動的公共文化空間，使本土居民在共同參與中強化文化記憶與社群歸屬感，同時讓中外遊客沉浸式感知中華文化的生命力。這一過程，致力於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與“愛國愛澳”情懷，融入具象的文化體驗與情感共鳴中，從而服務於中國式現代化中“精神文明建設”與“社會文明提升”的治理使命。

### （2）發展模式的轉型功能：從技術應用到治理範式現代化

中國式現代化強調“人與自然和諧共生”，並追求高質量發展。這要求公共治理本身必須實現現代化轉型。澳門的節慶活動成為展示和推動這一轉型的關鍵場域。例如，“澳門光影節”運用前沿投影技術活化世遺建築，此舉不僅是技術展示，更是政府對文化遺產進行創造性治理的體現，將靜態的“保護”

<sup>10</sup> “澳門名片集萃 | 非物質文化遺產：獨特的城市歷史記憶”（2025-09-10）。《澳門日報》。

<sup>11</sup> 胡曉東（2022）。“多族群雜居區節慶音樂文化的認同階序——以元江哈尼族傳統節慶‘咪奢扎’音樂展演的當代轉型為例”。《中國音樂》，3，97-107。

升級為動態的“價值再生產”。更為典型的是澳門國際貿易投資展覽會（MIF），其推行的數字化與綠色標準直接響應了特區政策。作為“以展招商”的關鍵平台，第29屆MIF不僅入場人次、商業配對及簽約項目成果顯著（其中近半數涉及“四大產業”），更通過推動數十家企業在澳門落地，展現了治理模式從短期活動管理向長期產業培育的戰略轉變。<sup>12</sup>這標誌著節慶活動的治理模式，從過去側重人流與經濟收益，邁向對產業培育、技術創新與長期社會效益的綜合考量，展現了中國式現代化“協調發展”與“高質量發展”理念在特區公共管理中的具體化與操作化。

### （3）國際合作的樞紐功能：從文化交流到全球公共產品供給

澳門的城市節慶活動是其履行國家戰略使命的關鍵支點。格蘭披治大賽車、國際音樂節、藝術節及國際煙花比賽匯演等活動，憑藉其國際聲譽，構成了澳門作為“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台”和“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軟性基礎設施。這些活動以開放的姿態匯聚全球資源，成為文明交流互鑒的常設平台。例如，由特區政府文化局主辦的第37屆澳門國際音樂節，匯聚了來自中國、俄羅斯、葡萄牙、瑞士等多國藝術家與樂團，在為期逾一個月的展期內呈現12個核心節目及14項延伸活動。<sup>13</sup>這類活動通過為各國人民提供持續的交流互鑒舞台、為藝術家與國際企業創造深度合作契機，從而超越了單純的文化與體育交流，具有了準全球公共產品的屬性。在此過程中，特區政府扮演著平台搭建者與規則維護者的協作治理核心角色，通過成功的國際性活動策劃與管理，向世界生動展示了一個在“一國兩制”下成功實踐、既保留中國文化底色又擁抱全球化的現代化區域形象。這不僅是服務於本地經濟，更是以澳門獨特的方式，參與和貢獻於國家“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宏偉敘事，體現了中國式現代化的世界情懷與開放品格。

---

<sup>12</sup>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招商投資促進局（2024-10-19），“【同賀雙慶】第29屆MIF及2024MFE促逾千場商業配對 專業觀眾入場升近14%”。

<https://www.ipim.gov.mo/zh-hant/ipim-news-zh-hant/2024-10-19->

<sup>13</sup> 央視新聞（2025-10-05），“第37屆澳門國際音樂節舉辦 中戲合璧打造藝術盛宴”。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845104158861594903&wfr=spider&for=pc>

## 五、優化路徑：強化公共治理效能的政策建議

在二十大報告中，習總書記提出：“必須守正創新，創新才能把握時代、引領時代”。<sup>14</sup>立足於前述對澳門節慶活動發展脈絡、組織現狀，特別是其推動社會共治、公民素質與認同提升、人與自然和諧共生、高質量發展等中國式現代化目標等方面體現出的治理瓶頸，本文認為，澳門節慶活動未來的發展應進行系統性升級。據此，提出以下三項相互關聯、具有針對性的優化路徑，以構建一個能有效服務於中國式現代化實踐的公共治理新範式。

### （一）創意賦權：從“單向參與”到“制度性共治”，激活社會內生動力

為促進節慶活動從“政府主導”向“市民共創”的範式轉變，並針對當前社會參與機制與價值評估體系中存在的優化空間，本節借鑒公共管理學中的“協同生產”理論，以系統性地提升“社會共治”水平與“文化認同”效能。依據 Pestoff 等人（2006）的理論框架，社會力量可通過“共同治理”、“共同管理”與狹義的“共同生產”三種遞進角色參與公共服務。<sup>15</sup>

#### （1）設立“節慶創意實驗室”：推動“共同治理”制度化

由文化局牽頭，聯合文化發展基金、高校及核心社團，成立常設性協作平台。其重要創新在於：該平台不僅徵集創意，更應納入年度節慶規劃的頂層設計流程，使得民間代表在議題設定與預算審議階段擁有參與權與建議權，從源頭上增強活動的文化深度與社群認同導向，使“社會共治”成為制度化安排。

#### （2）推行“節慶項目經理人”制度：促進“共同管理”常態化

對於入選的民間方案，政府可通過契約方式明確授權，並指派專職公職人員擔任“項目經理人”。其核心功能是作為官方資源協調的單一窗口，促進部

---

<sup>14</sup> 習近平（2022）。《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鬥》。北京：人民出版社。20-30。

<sup>15</sup> Pestoff, V., Osborne, S. P., & Brandsen, T. (2006). “Patterns of Co-production in Public Services: Some Concluding Thoughts”. *Public Management Review*, 8(4), 591-595.

門間協作，落實“民辦官助”模式。此舉有助於將社會創新活力轉化為可執行、可持續的治理夥伴關係。

### **（3）建立“活動影響力數字畫像”：實現“共同生產”可視化**

運用大數據技術，在傳統經濟指標基礎上，建構能實時追蹤社會聲量、公眾情感傾向、本土文化元素提及率等的數字化評估體系。該“價值畫像”可向社會公開，不僅衡量“共同生產”的成效，也可作為評估“文化認同”與“公民素質”提升效果的參考依據，推動決策從“流量導向”向“價值導向”轉變。

## **（二）綠色治理：從“倡導”到“價值內化”，塑造可持續發展範式**

### **（1）制定《澳門節慶活動綠色標準與認證體系》：建立清晰的價值指引**

由環保局聯合相關局級部門及業界，共同制定涵蓋活動全生命週期的分級標準。其意義在於：為“綠色節慶”提供官方參照，使環保成效可衡量、可比較。

### **（2）推行“綠色節慶試點與激勵計劃”：建構正向激勵循環**

選擇具代表性的標杆活動作為試點，提供“資金+技術”配套支持。其核心機制是將綠色認證結果與政府資助、宣傳資源等進行有效銜接，形成“綠色溢價”效應，引導主辦方從被動執行轉向主動參與。

### **（3）完善行政考核機制：強化價值導向**

在相關部門績效考核中，不過度側重單一減排數據，而是綜合評估其“綠色治理能力”，包括標準推廣成效、對主辦方的支持力度、跨部門協同效果等。藉此推動公共部門從監管者向服務者、合作者與助推者轉型，以系統提升綠色治理效能。最終，這一變革從根本上與“重點攻堅與協同治理”的系統理念高度契合。<sup>16</sup>

---

<sup>16</sup> “習近平：在全國生態環境保護大會上的講話”（2023-07-31）。《求是》雜誌。



### （三）開放協作：從“活動”到“平台”，嵌入國家發展大局

#### （1）倡導成立“粵港澳大灣區節慶與會展聯盟”：促進區域系統整合

澳門可積極推動建立常設性聯盟機構。其關鍵職能是加強頂層協調：統籌規劃“大灣區節慶日曆”以促進資源優化配置，聯合打造“一程多站”文旅線路，推動品牌共建與客源共享，實現從獨立運作向協同發展提升。

#### （2）設立“橫琴深合區節慶創新園區”：建構“前后台”產業生態

充分利用合作區政策與空間優勢，形成“澳門前台（品牌、營銷）+橫琴後台（製作、研發、儲運）”的協作模式。這不僅拓展產業物理空間，更有助於培育具競爭力的節慶產業集群。

#### （3）系統推動“以節慶促外交”的公共外交策略：提升戰略服務功能

在中央統一指導下，將品牌節慶（如音樂節、藝術節）有機融入“一帶一路”及中葡平台建設框架，通過設置“葡語國家單元”等常設性安排，使節慶活動從文化交流平台，逐步發展成為國家文化軟實力與對外政策的有效傳播載體。

## 五、結語與展望

總而言之，本研究的核心結論在於：澳門城市節慶活動的未來發展，關鍵在於實現從側重短期效益的“文化經濟招牌”，向著眼於長遠公共價值創造的“戰略性治理基礎設施”的根本性轉型。這一轉型的核心在於推動節慶活動從周期性的“管理客體”，轉變為能夠持續創造複合型公共價值的“治理主體”。

本研究具體論證了，這一“治理基礎設施”作為協作平台，在承載文化認同、驅動經濟轉型與促進國際合作等多維度上的公共價值。據此，本文所建構的以“創意賦權”、“綠色治理”與“開放協作”為核心的優化路徑，旨在系統推動其治理邏輯從“政府主導、社會參與”向“政府引導、社會共創”的範式演進。

展望未來，本研究開啟的學術對話可在多個方向深化：其一，開展案例比較研究，以提煉更具針對性的治理子模式；其二，引入量化評估方法，為政策

優化提供數據支撐；其三，將視野拓展至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探索跨區域的節慶產業鏈與協同治理新機制。

最終，將節慶活動作為“治理基礎設施”進行頂層設計與推進，對於澳門鞏固其“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獨特地位、豐富“一國兩制”實踐具有深遠意義，其經驗亦有望為全球同類型城市的現代化轉型提供獨特的“澳門範式”。